

原苏联

七年“改革”

纪实

主编 黄 宏
纪玉祥

红旗出版社

84469

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

黄宏 纪玉祥 主编

红旗出版社



(京)新登字108号

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

编 著 者 黄 宏 纪玉祥

责任编辑 李 凡 封面设计 王耀忠

出 版 红旗出版社(北京沙滩北街2号)

发 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河北省滦南县印刷厂

850×1168 32开 23.25印张 547千字

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ISBN 7—80068—350—8 /D·150

定 价 12.90元

出版说明

具有70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何以失败结局？这不仅是我国专业研究人员和理论工作者急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也为正在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大干部、群众所关心。本书是了解和研究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及原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历史进程及其教训的参考工具书。全书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下了自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到苏联解体六年多时间走过的历史轨迹。所选材料自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一致选举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始，至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止。在内容上则以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改革”为主线，力求涵盖这一时期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及苏共自身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活动和事件，客观反映苏联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力量及主要代表性人物的思想、言论和活动，国际舆论及世界知名人士对苏联改革进程的评述，客观反映改革进程中碰到的各种矛盾、冲突和战略性选择。主要材料除包括苏联领导人、主要反对派人物的讲话，苏联官方的文件、决议外，大量取自新华社提供的苏联国内外报刊的报道和评论，对国内某些研究机构的材料也作了参阅和利用。

编写者在材料的取舍上注意了一是客观性，力求准确反映苏联七年“改革”的本来面貌，不作主观评论；二是全面性，注意

反映苏联改革进程的各个侧面，全面反映各种政治观点；三是资料性，期望能够为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国际政治专业师生、政治理论干部研究苏联问题提供有代表性的翔实资料。

全书按时间顺序由几位研究人员分工编写。参加编写的人员有黄宏、纪玉祥、武在平、沈迎选、黄迎旭、陈学军、孟祥青。由黄宏、纪玉祥主编。

目 录

1985年.....	(1)
1986年.....	(17)
1987年.....	(34)
1988年.....	(71)
1989年.....	(119)
1990年.....	(225)
1991年.....	(424)

● 1985年

3月11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全会根据葛罗米柯的提议，一致选举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葛罗米柯在推荐时说：“政治局一致主张”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他“具有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领导过书记处”，“主持过政治局会议”；他“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善于迅速而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并作出结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工作经验丰富的人”，“不仅能够出色地分析问题，而且能进行综合和作出结论”；他“能以党性的态度待人，很善于组织人们并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他的判断“具有成熟性和坚定性”，具有“高强的本领”，“善于看到主要环节和使次要因素服从主要因素”；他“是一位有大气魄的活动家”，“是一位杰出的活动家”，“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

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发表就职讲话说：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和以后几次中央全会制定的战略方针，即“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方针”，“过去和现在都不变”，并作了具体阐述。他说：这一方针“指的是改造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关系体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体系”，“是人本身的发展，使人的生活和劳动的物质条件及其精神面貌有一个质的改进”，“这意味着使整个经济的发展服从于苏联人的利益”。又强调说：“党将坚定不移地奉行它所制定的社会政

策。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个纲领性原则应当以越来越深刻而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为此，“党把进一步完善和发扬民主以及人民的整个社会主义自治体系看作是国内政治中的一项根本任务”。“我们今后仍然需要使党、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组织工作更加公开。……人们越了解情况，做起事情来就越自觉，就越积极地支持党及其计划和纲领性目标”。

据塔斯社介绍，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2日生于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一个农民家庭，从15岁起当了5年联合收割机驾驶员，1952年入党，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随后回故乡从事党团工作。1967年读完当地农学院函授课程取得学位。1968—1978年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1971年4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8年11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农业；1979年11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翌年，升任政治局委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3月13日 戈尔巴乔夫在契尔年科追悼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苏十分关心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改善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同时又强调，要严格遵守秩序和法制，加强劳动纪律、国家纪律和党的纪律，要同任何讲排场、讲空话、妄自尊大和不负责任的现象作斗争。他还说，苏愿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在平等和互利合作基础上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3月14日 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接见前去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重申希望苏中关系能有重大改善。

3月17日 合众国际社说，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同苏联新领导人会谈后已纷纷回国，他们对克里姆林宫的新活力留下深刻印象。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戈尔巴乔夫对各种主张都是豁达的和不抱偏见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说，戈尔巴乔夫说话“直率明确”，他将会“十分大胆地利用世界局势”。

美国《华盛顿邮报》说，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年轻、受过

良好的教育、富有生气、待人随和”，“是一个新型的苏联人”。戈尔巴乔夫上台“标志着苏联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3月2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举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第一次例会。会议讨论并提出了动员全国力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同时，又强调加强劳动纪律、国家纪律和党的纪律，同讲排场和不负责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并强调进一步发展同美国的联系的重要性。

3月22日 《真理报》发表题为《苏共政策的现实主义》（谢尔盖耶夫）一文，提出苏联社会正处于历史上很长的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起点。又说，发达社会主义概念是苏共整个多方面工作的理论基础。发达社会主义是苏联社会向共产主义目标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客观上合乎规律的阶段。苏联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国防实力，改善苏联人劳动生活条件的方针，都要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

4月5日 苏共中央举行会议，决定采取重大的社会经济措施以及行政和医疗措施，同酗酒和酒癖做斗争，并要在这方面完善立法。

4月8日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工业联合公司和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领导人以及专家、学者的讲话中提出，不能让企业工作好坏一个样。他说：“为什么生产陈旧的、技术水平低的、不符合需要的产品的企业能正常过日子，甚至有时还很兴旺？这是因为经济机制允许这类现象。应当尽快地改变这种状况……”又说：必须提高干部的责任心、组织性和纪律性，“只有依靠加强秩序并同纪律松弛现象做斗争，依靠企业良好劳动节奏，劳动生产率 and 产品质量就会很快提高，其他各种成果也会改善。”同时，还提出要在加强统一计划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权力。

4月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作了题

为《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苏联社会“必须继续变化和改革”。他说，“争取达到社会的新的质的状态，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新的质的状态。这首先是生产的科学技术更新和达到劳动生产率的世界最高水平。这是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的改善。这是劳动领域、人的生活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深刻变化。这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整个体系的活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和人民自治”。并且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他说：“国家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上在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后如何引导我们的事业。我们应该广泛利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并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符合现代条件和要求，我们应当大大加速社会经济进步”。关于如何达到这一战略目标，他说道：“只要把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置于我们整个工作的中心，改革管理和计划工作以及结构和投资政策，普遍提高组织纪律性，根本改进工作作风，那么，加快增长速度，而且大大加快增长速度的任务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在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还讲到“民主”与“公开原则”问题，他说：“应当永远牢记列宁关于不应该抽象理解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思想。这一思想过去和现在都是发展经济、提高人的积极性和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这正是党过去和将来工作以及加深苏维埃制度的民主作风的关键所在”。“各级党委应该关心，如何保证实行公开原则，如何使群众联系的各种渠道畅通，如何重视舆论、批评性意见、公民的申诉和来信”。关于对外关系问题，他说到：苏联“将坚决遵循列宁的和平与和平共处方针，这一方针是由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道德和世界观决定的。我们主张平稳的、得体的，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真正尊重国际法准则”。又说：“世界大战是可以制止的。但是，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争取维护和平和确保普遍安全的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要求不断作出

努力。由于帝国主义的过错，国际局势仍使人感到不安和危险。人类已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使紧张局势和对抗进一步加剧，要么建设性地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这种协议能够阻止从物质上准备核冲突的进程”。

全会增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尼科诺夫为中央书记。

后来，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道：这次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给改革的构想提供了依据。”

4月27日 戈尔巴乔夫在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时，在华沙同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会晤，重申对波争取加强社会主义阵地的斗争的声援。

5月8日 戈尔巴乔夫在纪念战胜法西斯40周年大会上作报告。他说，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是伟大的和令人难忘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在前线和后方领导了巨大的工作，苏联没有忘记盟国给苏联的物质援助。并说，苏联坚决主张恢复70年代的缓和进程，建立没有战争的世界。

5月17日 戈尔巴乔夫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题为《坚定不移地前进》的讲话，阐述了为什么要制定和推行加速发展战略，他说：“最近我们是以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大约为百分之三的幅度向前发展的……计算表明，我们至少需要百分之四。如果达不到百分之四（本来需要更高一些），那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办？降低提高生活水平的速度吗？压缩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计划吗？我们不能同意这样做……看来，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制定的以及我今天扼要地告诉你们的概念（即加速发展战略——编者注）是正确的。”在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还号

召与酗酒、纪律松弛、舞弊行为、违法行为、官僚主义、不劳而食、经营不善、浪费和其他消极现象进行斗争。

同日，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布决议和采取措施，严格制止酗酒现象，并对酗酒者进行严厉制裁。

6月11日 苏共中央召开加速科技进步问题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党的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的报告，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是全党和全体人民的任务”。并指出加速发展战略，“不仅仅是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提高，这里也指的是发展的新的质量，向集约化发展轨道过渡，在一些具有战略性重要意义的方面迅速向前进，对经济进行结构改造，利用有效的管理形式，组织和刺激劳动以及更充分地解决社会问题。”在解释这一战略的提出时，他说：“从七十年代初起，经济发展中开始出现某些困难……这就是：没有在应有程度上考虑到经济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在改造结构政策、管理的方式和方法以及经营活动的心理方面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坚定性。使重心转到发展的集约化因素方面的问题讲了多年了，但已采取的措施不够彻底，不一贯，也没有进行到底。结果，经济依然主要是在粗放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党和全体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克服消极倾向，使情况迅速好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不能走压缩社会计划的道路”。“严峻的外部情况也要求必须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国家不得不拨出大量资金用于防御。实现了同美国的军事战略平衡，这是历史性成果……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威胁，必须坚决加强祖国的防御力量，不允许取得对我们的军事优势。”“社会主义将用自己的经济政策以及社会经济成就来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主要影响。在世界进步公众的眼目中，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是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的社会希望的体现。它应当成为具有极其高度的组织性和经济效益的典范。”在讲话中他还谈到“改造投资政策和结构政策”、“进一步发展和有效利用科学技术潜力”、“完善科学技

术进步的管理”、“把党的工作提高到新任务的高度”等问题。

6月21日 《真理报》发表文章，批评有人用修正主义立场解释社会主义所有制，批评一些学者鼓吹削弱国家调节经济的杠杆，提倡市场竞争和扩大市场经济成分的比例。

6月26日 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共和国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钢铁厂发表讲话，阐述了贯彻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关于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方针的措施，他说：“苏联需要在很多方面立即同时推向前进，不这样就不能加快发展。有待改进整个管理和计划工作制度，提高苏联国家计委对国民经济最终结果的责任心，同时，建立一批同类部门的管理机构……将改变各部的作用和责任，它们应当成为科技进步的参谋部，应当把注意力放在确保满足国家和居民对有关优质新产品的需求上。为此，需要精简管理机构，取消多余的环节。”

6月27日 戈尔巴乔夫在基辅举行的党组织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坚决执行拟定的方针》的讲话，提出“加速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今天任务中的任务”，由此，苏联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生产的全面集约化和结构改革”。又说，“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经济集约化的极其重要的手段是科技进步”。并且还提出：“实现科技革命的计划首先同发展机器制造业有关……，通过机器制造业使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实现科技进步”，因此，“注意力应更集中在机器制造业的最新方向”，要加速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关于管理体制改革的，他说：“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不是市场，也不是自发力量，而首先应当是计划。同时，应当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应当明确地作出规定，全联盟一级作什么计划，共和国、州、部或企业一级作什么计划。”

6月2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毕业生典礼上讲话说：苏联拟定的经济改革，将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范畴内进行，丝毫不会走上“市场经济”和“私人经营”的方向。“苏联改革的道路是，竭尽全力加强集中计划并同时加强企业的独立性和责任，发挥经济核算制，按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利用商品货币关系”。

7月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决定：解除罗曼诺夫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罗1976年任政治局委员，曾是总书记人选之一）；提升政治局候补委员谢瓦尔德纳泽为政治局委员，叶利钦、扎伊科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发表公报强调，必须坚决完善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并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党对国家建设及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所有方面的作用，使社会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明确履行自己的职能。

7月2日 第十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选举葛罗米柯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作了发言，他说，他不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因为，过去由一人兼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在当时条件下是正确的，但现在国家处于重要时期，新的任务要求对党和国家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对各级干部的配备提出修正，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要求提高党中央和政治局的工作强度，总书记要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并强调要加强苏维埃的作用，各级苏维埃应干预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7月13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展新的管理方法以及用新的管理方法加速科技进步的问题。会议规定要进一步使劳动集体和国民经济各环节从切身利益上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提高新产品质量。要进一步扩大企业利用发展生产、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的可能性。并决定从

1986年起进一步扩大转入新经营条件的部的数量。

7月29日 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从8月6日起单方面停止核试验5个月，希望美国对此能作出积极反应。

7月30日 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纪念欧洲安全合作会议10周年的集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欧安会说明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说，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苏联渴望同欧洲各国建立稳固可靠的关系。又说，苏联主张把意识形态分歧同国家间关系分开，坚决反对任何人干涉自己的内政。

8月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例会决定，1986—1990年用于发展机器制造业的投资将超过“十一·五”计划期间投资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其中百分之五十的投资用于改造现有企业。

8月28日 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在谈到苏美关系时说，苏美关系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不管我们彼此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只能一道生存下去，或者一起死亡。我们应当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最终愿意承认，除了彼此和平共处之外就没有其他出路，是不是准备把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战争轨道转到和平轨道上去？你们有一句俗话：自己活着，也要让别人活着。我们把这称之为和平共处”。在谈到国内问题时，他说，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是极重要的最优先的任务，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改进对投资的利用，优先发展这样一些极重要的部门：如机器制造业、电机工业、电子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等等。农工综合体各部门、特别是农产品的加工和储存仍然是注意的中心”。又说：“改进国民经济工作要求在经济的战略方向上进一步加强集中制——使各部门、地区、经济上的各个环节更严格地服从经济发展的利益。但我们同时也在走这样的道路：加强管理的民主原则，扩大联合公司、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发展地方的自治，鼓励主动

性和进取心，当然，是要有利于社会，而不是危害社会”。“我们正在进行重大的经济试验，其实质是，建立更有效的、能够大大加快科技进步速度的经营机制，改进各种资源的利用。我们力求使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刺激杠杆，以及诸如利润、价格形成、贷款、经济核算等工具为解决这一任务而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根本改进整个管理和计划体制工作的实质”。“与此同时，把加快经济发展的其他潜力也包括进去。加强纪律和秩序，提高对所有的人——从工人到部长的要求，同渎职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培养职业道德，加强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又强调说：“我国现在做的事并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这反映了我们整个领导的共同意见。我们确信，我们做得对。这些问题已经成熟，并且必须加以解决。”

9月6日 戈尔巴乔夫在秋明州和托木斯克州党的积极分子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题为《西伯利亚要加快步伐》的讲话，强调加速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生产力是苏联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批评秋明已经3年未完成石油开采计划，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困难。在指责秋明地区领导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时说到：“对人的态度，关心人，这是我们政策中的主要问题。”

9月7日 戈尔巴乔夫在哈萨克共和国各州与乌拉尔各边疆区、州党 and 经济工作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增加粮食资源》的讲话，他说：“在秋明讨论了燃料动力综合体的现状，继此之后，今天我们又讨论粮食问题，这不是偶然的。没有这两项，就不可能有有效经济，就不能顺利解决提高人民福利、加强国家经济和国防实力的任务。必须深刻认识这两个基本因素对发展苏联经济的意义。”在讲话中他还提出：“党委是政治领导机关”，党委“应当在新的条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应当把过去所行使的一部分职能转交给区农工联合公司，而去更扎实地研究干部的选择、配备和培养问题，研究、监督劳动集体的社会发展、提高人

们的觉悟和加强纪律的问题。这正是对顺利解决经济任务、社会任务和政治任务产生巨大影响的那些因素。总之，区委应该集中力量于那些除它之外谁也不能解决的任务。”

9月18日 苏共中央讨论了《关于消除酗酒现象措施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强调要开除酗酒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籍和公职。

9月26日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斯达汉诺夫运动老战士和先进工作者时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是伟大的和永恒的，它是争取一切先进事物，反对陈旧事物的象征。今天劳动竞赛的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是竞赛的形式和方法没有完全符合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性质。今天的主要口号是速度、质量、节约、组织性，要利用各种方法，首先是科技进步成果来达到预定的目标。还说，精神刺激和社会承认他们的功绩同样重要，有时则更重要。

9月2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雷日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原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退休。

9月30日 戈尔巴乔夫在访法前夕对法国电视观众发表讲话，之后，又接受了法国电视公司记者的采访。关于对外政策，他说道：“……国际紧张局势在发展。导弹核浩劫的威胁并没有减弱。必须正视这种令人痛苦的现实。……为了活下去，为了保障自己子孙的未来，应当制止丧失理智的势力，制止战争和军国主义势力。必须在战火燃烧起来之前就扑灭它”。“能否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相信是能够做到的。我们已经有可以依靠的有益经验——缓和的成就。它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始终不渝地遵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所有条款，就再次能使欧洲的气候正常化，就能驱散欧洲上空密布的乌云”。“伏尔泰曾幻想过作为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必要条件的理智的胜利。法国伟大儿子的这个呼吁在核武器取代了弩和剑的今天尤为迫切。我们来得及弄清楚，谁的意识形态、谁的观点和法律更合乎道德要求，谁的经济更合